



学术研究

- ※ 学术成果
- ※ 学术研讨会
- ※ 澳大利亚历史年代表
- ※ 澳大利亚作家作品介绍
- ※ 澳研成员毕业论文摘要

早期来华的两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和端纳

王莉

乔治·厄尼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于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1894年他到中国西南旅行3个月,对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考察,写成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189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此书成就了他做记者的梦想,使他成为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1897~1912年莫理循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1920年担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是清末民初中国发生的许多划时代事件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莫理循在20世纪头二十年的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都是最为重要的“中国通”,故而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

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在来华外国人中以“莫理循大街”而闻名。不仅如此,他在王府井大街的寓所建立的图书馆收藏了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书刊,且不乏珍本。1917年售予日本岩崎久弥男爵,后成为日本东洋文库的一部分。另外,他还保存了大量文件、日记、书信、图片、票证,等资料,是研究20世纪中国及远东历史的重要文献。历史学家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原由骆惠敏先生收藏和整理,2006年3月,Helen Julia Lo女士将莫理循手稿及骆教授的工作手稿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身后由妻子捐赠给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

莫理循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他通过手中的笔和相机,向世界介绍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地理面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利益争夺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后的暴行。他同情维新、革命人士,对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中国表示欢迎和支持,迅速向世界报道中国的事态,说明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而他向西方世界报道清末“新政”改革的活动则把列强对中国的看法从一无是处中提升出来,打破了《泰晤士报》长期以来悲观、指责中国的论调。担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完成向西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工作之后,又劝说袁世凯放弃帝制。

莫理循的职业生涯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之所以成为莫理循也正因为他与中国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历史已经和莫理循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年—1946年11月9日)是民国时期中国政坛上最为活跃的西方人,被称为“中国的端纳”。

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里斯峪,曾作为印刷厂的排字工,23岁成为新闻记者,1903年赴远东采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当时的新闻

记者通过包罗万象的记叙,大胆充当决策权威,实现对“荣誉与权势”的追求。依托这样的时代天幕,(端纳和宋美龄)

28岁的端纳踏上了中国。此时的他,生机勃勃,对民主事业怀抱信心,对积弱落后的中国充满同情与改造的渴望。

他先在香港接受《德臣报》聘请担任副主编,后来成为当时两广总督张人骏的顾问,并结识革命党人胡汉民、宋耀如等人,1911年,他以《纽约先驱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抵达上海,联系上伍廷芳,并成为武昌起义的上海总部顾问,孙中山回国后,他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他曾经首先获得袁世凯秘密的“二十一条”卖国协定,并将其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引起世界轰动,从而促使

“倒袁”成功。他曾帮助张学良戒除吸鸦片，促使其东北易帜，并帮助中国政府进行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作为调停人，数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端纳还建议蒋宋会见周恩来，动用周恩来的影响，说服不同意释蒋的杨虎城等西安将领。

端纳始终希望中国发展政治民主，1940年，因为和蒋介石意见不和，他辞职离开中国，驾艇环游太平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宋美龄急电端纳恳请其回中国助战，端纳在回中国途中，经过被日军占领的菲律宾时被关入集中营，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在悬赏捉拿他这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但集中营中的人没有一人出卖他。

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要求，美国远东地区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专门解救端纳，空降兵占领了关押端纳的集中营，而后将他用美军直升机送往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由于颠沛流离，端纳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常在病榻上大口咯血，在沉疴中诵念尼采的名诗《太阳落了》。在他病入膏肓时，宋美龄派飞机接他回上海医治，（端纳和宋美龄）

弥留之际，宋亲自立在他床侧为他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他曾希望能长眠于中国，这位对中国有所贡献的澳大利亚人的灵柩被安葬在宋氏家族墓地中。

端纳是幸运的，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找到了一块实验基地，并孵育出一份期盼中的收获。西方评论家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像端纳为中国工作那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作为对这位澳大利亚人的最高致敬，便是国人赠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端纳”。

